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65

2007年9月20日

封堵真實的偏見和敵意

原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 熊蕾¹

申辦奧運會的“資格”

1993年9月，我參加第一個中國女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問美國。在一次招待我們的晚餐會上，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年輕的獨立製片人，說她是羅伯特·肯尼迪的女兒，也就是前總統肯尼迪的姪女。

我心中湧起對肯尼迪小姐的同情：她的父親和伯父都是慘遭暗殺身亡的，父親死時她還不大懂事。幼年喪父，這該是怎樣的一種人生不幸？

¹ 本文是李希光、劉康等：《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第二章中的三節，為印《香港傳真》，作者恢復原稿標題。

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們剛剛握過手，彼此還沒有寒暄一下，她就不客氣地劈頭問道：“你認為中國有資格申辦奧運會嗎？”——當時北京正在蒙特卡羅角逐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

坦白地說，我個人對北京申辦奧運會並不贊同。主辦一次奧運會，雖然會使北京和中國名聲大振，也會產生鉅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我認為無論是在申辦過程中還是申辦下來之後，整個活動都會過於加重政府財力和老百姓的負擔。然而這位肯尼迪小姐的問題卻讓我感到一種侮辱。我反問她：“這是什麼問題？中國憑什麼沒有資格申辦奧運會？”

她似乎很奇怪我會有此一問，怔了一下，說：“中國的人權記錄那麼不好，比如監獄裡對犯人的虐待……”

我說：“第一，中國政府的政策並不允許虐待犯人。至於個別地方有違反，那是哪個國家都免不了的，美國的警察和監獄也有體罰犯人的情況，不是嗎？”她點了點頭。我又說：“第二，中國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生活在監獄中，也沒有感受到你們所說的那些人權問題。為什麼在你們的眼裡，只有關在監獄裡的才是中國人？”她愣了，坦白地說：“我從來沒想到過這一點。”我也誠懇地對她說：“如果國際奧委會認為北京的體育場館的設施以及整個城市的環境、交通等條件不夠理想，達不到主辦奧運會的要求，那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以所謂人權問題為口實，說中國沒有資格申辦奧運會，我絕對不能同意。中國申辦奧運會的資格不比任何國家差。”肯尼迪小姐承認這樣講很有道理，點著頭說：“我還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個問題。”

那天晚上，我們談得很愉快。我認為，像肯尼迪小姐這樣的美國人，還是挺正直的。她們受美國媒介對中國的歪曲和片面報道的影響，對中國有不少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是她們並不固執己見，願意瞭解事實。如果你能用事實和道理說服她，她會放棄她

的成見。

不能放棄這種成見的是那些主流媒介。誰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美國人口的將近六倍。然而在美國新聞媒介中，你能見到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中國人，往往就那麼幾個，即所謂“異見分子”，或曰“持不同政見者”。其實說白了，就跟我們中國“文革”時期那種“鬧而優則仕”的人一樣，誰鬧騰得最歡實，誰就會像勇士一般以勝利者的姿態頻頻出現在西方媒介中。

我中學時代同年級同學魏京生，就是一個例子。作為老同學，我不想說他什麼。不過我很同情他。不是同情他別的，而是覺得他被西方媒介已經捧得沒有了退路。西方媒介人為地把他弄成一種偶像，使他不能不硬挺下去。否則，他好像就沒有了價值。說實在的，西方媒介和某些西方政界人士把他搞成中國政治的一個“晴雨表”，一有風吹草動，就拿他來說事，真是害了他。

我曾跟美國某大報的駐京記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也覺得我的看法不無道理。但是他說，他不能不把焦點對著這些“異見分子”，因為在其他西方媒介都關注著他們的時候，如果他不發出這方面的報道，他的報紙就會很難堪。也就是說，那些媒介需要中國有這樣的人存在。

於是，出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主流新聞媒介中的中國人，就儘是一些所謂“人權鬥士”了。於是，中國申辦奧運會的“資格”就有了“問題”。於是，中國的“人權記錄”就“糟糕”起來。

問題是，人權是否意味著煽動顛覆政府、出賣情報、製造動亂的權利？一個主權國家的司法機關有沒有權利依據本國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處罰那些觸犯刑律的人？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是認同、是不是需要這樣的“異見分子”和“人權鬥士”？

1994年3月我去紐約開會時，看到那個叫“中國人權觀察”

組織的一份期刊，居然把因向境外一家報紙出賣機密文件而被判了 15 年徒刑的北京某新聞機構的一位記者，描繪成為爭取“新聞自由”而犧牲的戰士。這算哪門子“人權”？

順便交代一下，據一位旅居美國多年的朋友介紹，“中國人權觀察”的“母組織”，即“亞洲觀察”，其很大一部分資金是由“國際民主基金”提供的。這個“國際民主基金”，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於 1983 年創辦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顛覆別國，首當其衝的就是所謂“與美國敵對”的國家。這位朋友說：“我們碰到這些‘人權’組織的人，跟他們爭論起來，一提這個背景，他們就蔫了！”

就在我寫到這裡的時候，一個攻擊中國的所謂“人權問題”最起勁的組織，“大赦國際”的一個法國人來找我。說實在的，我若事先知道她是從這個組織來的，根本就沒有興趣見她了。但是她在電話上只說她在北京世婦會期間見過我，這次又來北京參加國聯第 96 屆大會，想再見見。待到見了面，得知她的真實身份，我真有些感到像吃了蒼蠅一樣膩味。因為這個組織經常用一些子虛烏有的案例，誣衊中國“踐踏人權”。而且他們還發動很多或是不明真相或是別有用心的各國方方面面的人，給中國有關部門和人士大量寄信請願，為一些社會渣滓或根本不存在的“冤案”說項。我的一位擔任一家報紙副總編的好友說，世婦會前，這樣的信件她一天能接到上百封。世婦會期間，這個組織的人又借機組織示威，將某些因觸犯了中國法律而被判刑的人說成是中國的“人權鬥士”，公開為他們鳴冤叫屈，公然無視中國的司法主權，更不顧事實。如果說一般中國人過去對這個組織不大瞭解，那麼他們在世婦會期間的表演，可引起了不少中國與會者對他們的極大反感。而且這個組織和西方那些主流媒介的關係特別密切。按我們跟美國老師所學的西方新聞的原則，新聞媒介對送上門來的

材料應當持懷疑態度，應當向被批評或被攻擊的一方核實，然後才能發表。可是西方主流媒介對“大赦國際”攻擊中國的材料，似乎從來沒有懷疑，也沒有核實，總是來者不拒。

我雖然不喜歡這個組織，但既然誤打誤撞地見了他們的人，也不好就趕她走。且聽聽她說什麼。沒想到她竟訴起委屈來，說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非政府組織，沒人願意答理他們。我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她，那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你們總是憑一面之詞，以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誣衊中國。大家都認為你們是敵對組織，當然不願意理你們。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首先你們必須做出改變，最起碼要實事求是吧。

我不能奢望這些話會起什麼作用。但是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訪，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個打著關心“人權”的幌子、經常干涉我們內政的組織在中國搞到沒有人願意答理的地步，他們自己都覺得怪沒趣的了。

我並不認為中國沒有人權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有著 12 億人口、公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還相當低的大國，中國不可能沒有人權問題。但是，且不說作為中國人，我們的切身感受與西方媒介常常報道的“人權問題”之間的差距有多麼大，單是他們開始“關注”起我們的“人權”的時間，就使我對他們的動機很有懷疑。

1927 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在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下，成千成萬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慘遭屠殺，“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請問，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對中國人權的關心，體現在什麼地方？

抗戰時期，美國《時代》週刊駐當時的陪都重慶的記者白修德，發回很多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統治，搞得人民群眾民

不聊生的報道。當這些報道以白修德的署名發表在雜誌上時，已經面目全非：那些抨擊和揭露都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的讚頌。後來，白修德不得不在他重慶辦公室的門上貼了一個聲明：“以本記者名義在《時代》發表的任何報道，如果與本人觀點相符，純屬偶然。”再後來，他遭到解僱。請問，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對中國人權的關心，又體現在什麼地方？

還有渣滓洞、白公館、“中美合作所”，還有那裡面種種殘酷折磨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的美式刑具；還有那些幫助國民黨打內戰、讓中國人自相殘殺的美式武器和裝備……請問，那個時候，中國的人權有沒有問題？那時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又是如何關心中國人權的？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但是美國卻對我們實行封鎖和禁運，一次又一次把戰火燒到我們的家門口，還在朝鮮戰爭期間向我們的東北地區投擲過細菌彈。請問，那個時候，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是怎麼關心中國人權的？

可以說，在新中國的歷史上，人權記錄最糟糕的時候應該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就連共和國的主席和創立共和國的一代元勳，都沒有的人身安全可言了。然而中美關係偏偏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解凍，走向正常化的。那時，我們並沒有聽說哪個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口實，反對中美兩國政府領導人的這一舉措。

西方新聞媒介開始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提高的時代。當然，我們在經濟轉型期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諸如腐敗問題、社會治安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剩餘勞動力問題、就業再就業問題、貧困問題、社會保

障問題……但是我們中國人並沒有忽視這些問題。我們通過人代會、政協，通過新聞媒介，通過種種渠道，探討著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我們在盡一切努力，使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當然需要來自國外的批評、意見和建議。然而，西方主流媒介對我們的“人權”的關注，卻使我感到厭惡。因為那完全是虛偽的關注。那種關注，並不是因為確實有這個問題存在，更不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身。他們的關注是為了需要，為了仇視中國的需要。

英文《中國日報》1996年8月19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題目是〈美國媒介熱衷於憎恨中國〉，寫得很有意思。文章開頭寫道，美國一家報紙的駐京記者一天晚上在和作者私下閑聊時談到：“坦白地說，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在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比前十年已經進步多了。”作者當即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寫點什麼，告訴你的美國讀者這些實情呢？”文章沒有講這位美國記者對這個問題是如何回答的。但那並不難想像。即使他寫了，他的報紙也不會登出來。因為這樣對中國的正面報道，儘管是事實，卻不符合美國新聞媒介仇視中國的需要。

看起來，如今的美國記者，不要說同埃德加·斯諾相比，就連當年《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勇氣都沒有。白修德明知他的報道有悖於他的雜誌，或者說他老闆的政治立場和編輯方針，卻仍然堅持寫出真實的情況，儘管那不為他的老闆所喜歡，而且最終影響到他的飯碗。

促進理解，還是播種仇恨？

從1996年9月1日起，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做了改革，取消了英語翻譯，問答完全用中文進行。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

卻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駐京記者的不滿。有的說這表明中國的開放政策“有所改變”；有的說這是中國新近湧現的“反美情緒”的一個體現；美國《新聞週刊》甚至以漫畫嘲諷這一舉措。

我不知道這些記者有沒有在他們本國政府機構採訪過。我訪問過的歐美國家，新聞發佈會一律用本國語言問答，決沒有任何外語翻譯。有的北歐國家至多提供一些譯成英文的文件。但是外國記者若想提問，對不起，你只能講駐在國的官方語言。至於美國，新聞發佈會不僅沒有外語翻譯，而且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類的部門，只有本國記者參加新聞發佈會才有座椅，並且誰坐在哪裡都是固定的。外國記者要經過嚴格的報批手續，才能進來旁聽，還只能“打站票”，連提問的資格都沒有。1988年，我和其他幾個亞洲國家的記者作為美國東西方中心的“傑斐遜學者”訪問白宮時，曾就外國記者不能平等地參加白宮新聞發佈會的問題，向接待我們的白宮新聞辦公室官員表示過不滿。那位官員卻不在乎地說，外國記者有外國記者中心嘛，他們可以在那裡通過閉路電視看到白宮新聞發佈會的實況。

按照對中國外交部的改革感到不滿的那些西方記者的邏輯，白宮新聞發佈會如此安排，是否表明了美國政府的“閉關自守”呢？是否表現出美國的“反華情緒”或反對其他國家的情緒呢？為什麼西方記者對此不置一詞呢？最起碼，中國還沒有將外國記者排除在新聞發佈會之外，用“外國記者中心”來打發他們。如果中國完全按照美國的方式行事，不知那些西方記者又會作何感想？英文本不是中國的官方語言，更何況中文還是聯合國的五種工作語言之一。中國的外交部在中國首都使用中文來開新聞發佈會，既順理成章，也符合國際慣例。可是，在這種問題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那些記者就不做橫向比較了，非把這麼一件自自然然的事說成是“反美”。

這僅僅是最近發生的一件小事。就是這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聞媒介對中國抱有多麼大的偏見。他們很少能做到“換位思維”，即從他們的報道對象，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處的實際情況，來認識和理解別人面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他們一味從自己的價值觀念出發，幾乎對中國的一切都抱有懷疑或敵意。

這種懷疑和敵意，有時簡直不可理喻。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可以說就很典型。那是1982年10月，全國記協邀請中外記者參觀採訪清華大學，瞭解當時中國高等學校如何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培養人才。那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組織外國駐京記者採訪中國的大學，參加那次活動的外國記者很多。我作為新華社記者，也參加了這次活動。為便於大家採訪，在清華大學領導介紹情況之後，記者們被分成若干組，與各系的學生代表座談。座談之後，學校準備安排記者去看學生們每天下午的體育鍛煉和其他課外活動。

我參加的那個組有幾個美國和西歐記者。座談伊始，這幾個記者劈頭就問學生：“你們一定是經過挑選來接受我們採訪的。你們是怎樣被挑選出來的？”“你們對這次採訪一定做了精心的準備。你們準備我們會問什麼問題？你們認為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什麼？”學生們被這些無禮的問題激怒了，也很不客氣地說，我們是為促進理解和交流而來，如果你們對我們連起碼的信任都沒有，那就不必在這裡浪費時間了。你們可以自己到校園裡去走走看看，願意找誰就找誰。一時間，室內的氣氛頗有些緊張。後來其他真心要瞭解情況的記者開始了正常的提問，採訪才又進行下去。結果那幾個挑起不快的記者也沒有走，他們後來又問起學生們知不知道魯迅的孫子為和一位臺灣姑娘結婚，去了臺灣的事。大多數學生都說不知道，少數學生說，聽BBC或“美國之音”的

廣播說過這事。一位美國記者馬上抓住這一點，說，這是否說明，你們不能從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中充分得到你們想知道的新聞信息，而不得不從外國廣播中去獲取消息。對此，學生們回答說，我們聽外國廣播，主要是為了練習和提高英語聽力。至於你們感興趣的消息，大家的新聞價值觀念不一樣，你們認為有價值的新聞，我們並不一定認為有價值。

那次活動已過去十多年，我依然記憶猶新，的確是因為那幾個西方記者在採訪中表現出來的傲慢和無禮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根據我所學的新聞採訪原則，記者是不應當輕信的。然而不輕信並不等於可以對採訪對象毫不尊重、肆意挑釁。就這次採訪活動而言，如果認為安排不當，可以向中國記協和清華大學校方提出意見，甚至可以拒絕參加。既要參加，卻又對無辜的學生動以顏色，將對主辦者毫無來由的敵意發泄到學生身上，未免也太過分了。我見過不少西方記者對他們本國的各階層人士進行採訪，卻沒有見過一例詰難被採訪對象接受採訪的資格的提問。

很多訪問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中國人都感到那裡的人對中國很不瞭解。一般西方人所瞭解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差距之大，往往令我們中國人吃驚，甚至氣憤。許多訪問過中國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人也感到，他們親眼見到的中國，與他們在本國媒介中讀到看到的中國，大不一樣。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媒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媒介出於慣常的敵意，只報道中國負面的、消極的東西，使中國只能以可憐、可笑，乃至可惡的形象，出現在西方公眾面前。

1995年3月，我和其他幾位中國女新聞工作者應邀去美國依阿華大學參加“世界婦女與傳媒研討會”暨各國非政府組織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為籌備“95論壇”召開的第三次磋商會。東道主安排我們訪問了一系列新聞機構，其中有美國廣播公司（ABC）、

NBC、一些地方電視臺，以及一些大學的新聞傳播院系。和我們座談的人，包括不少資深記者、編輯、主持人、教授等，問起中國，他們幾乎無例外地只提出兩個問題，即所謂西藏“沒有人權”和中國政府“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大規模溺殺女嬰”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提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後來一聽到它們，我們都不怒反笑了。我們問對方：“除了這兩個問題，你們對中國還知道些什麼？”這時他們很多人就會無言以對。

西方媒介對中國這種偏狹的報道，不僅使我們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也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非常不滿。在依阿華大學的那次研討會上，在一場與中國並不相干的專題討論中，一位美國記者在提問時又突然提出，世界傳媒應當對中國所謂的“西藏問題”和“溺殺女嬰”問題予以關注。她的話音剛落，未等我們中國人站起來，印度婦女特稿社的社長阿尼達便搶過話筒，憤怒地質問：“為什麼有些發達國家的記者一提到中國，便只是這兩個問題？”他們對發展中國家沒有，也不願有真正的瞭解。他們同發展中國家的記者和人民有很大的隔閡。

誠然，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加上中國和西方國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本來是客觀存在。我以為，正因為有這些差異存在，人們才需要彼此瞭解和溝通，以求同存異，使我們共同生存其間的這個世界大環境能夠和諧一些。新聞記者和媒介，本應是這種溝通和理解的橋梁。

既要溝通和理解，那就有個怎樣對待這些差異的問題，也就是怎樣對待別人與自己的不同的問題。就拿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來說，中國有 12 億人口，是美國的近六倍，而耕地面積只有美國的二分之一。我們現在已經在消耗下幾代人的資源。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今後的生存質量，中國的人口當然不能沒有計劃、沒有節制、沒有控制地增長。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因而得到了全

國大多數人民的理解和擁護；而且這個政策在實行中是按照分類指導、因地制宜的原則，儘量做到合情合理。但是，由於中國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幹部的水平素質良莠不齊，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有一些偏差和失誤。這些消極的東西，決不是計劃生育工作的主流，更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的計劃生育工作，正是在不斷克服這些偏差和失誤，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展的。但是，西方媒介對中國計劃生育的報道，專在溺殺女嬰上做文章，專門把個別地區個別人的偏差和失誤說成全局性的、受到政府肯定的行為，導致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誤解極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不久，西方媒介又在中國的糧食自給問題上大做文章，宣揚中國在下個世紀將不能養活自己，會大量進口糧食，從而對世界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這也是他們宣傳的“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他們卻沒有想一想，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正是為了確保能夠養活自己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這不僅是對中國的未來，也是對世界和人類的貢獻。西方媒介對這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的報道如此顧此失彼，恰恰說明他們對中國的報道缺乏實事求是的誠意，而是出於偏見和敵意。

美國新聞界和政界似乎很在乎他們所謂的中國最近出現的“反美情緒”，尤其是年輕人中的“反美情緒”。幾個年輕人寫的《中美較量大寫真》和《中國可以說不》，引起了他們相當的重視。然而，他們在對這兩本書的報道和評論的字裡行間，往往透出這些書是“有背景”、“有來頭”的意思，好像中國民間不可能自發地湧起“反美情緒”，這種情緒必定是來自政府的煽動。就連遠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抗議 NBC 在奧運會報道中誣衊中國和其他國家運動員的活動，也被他們說成是有中國官方組織的因素。

其實，這個結論仍是出自他們的偏見和敵意。第一，無論寫這些書的幾個年輕人，還是廣大的中國老百姓，都不存在什麼“反美情緒”。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我自己的老師中，就有兩位美國人，很令我敬重；我還有不少美國朋友，待人都很真誠，我很喜歡他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接受美國政界和主流媒介對中國的那種傲慢、偏見和敵意。難道對這種態度表示反感，就是“反美情緒”？難道只許美國對別的國家頤指氣使，別人對此只能逆來順受，卻不能有所不滿？中國的一句古話說得好，“不平則鳴”。對中國充滿偏見和敵意的報道，影響了美國輿論對中國的看法乃至對華政策，令一些中國人憤憤不平，他們把這種不平表達出來，乃是理所當然，談不上什麼“反美情緒”。第二，如果說所謂的“反美情緒”有什麼人煽動的話，那麼煽動起這種情緒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人自己。若不是美國的一些政客和媒介在中國申辦 2000 年奧運會問題上搞小動作，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的內政，若不是美國的主流媒介總是那麼起勁地誣讒攻擊中國，中國人怎麼會有“反美情緒”呢？與其抱怨別人“反美”，何如檢點檢點自己的言行？只可惜美國的政客和主流媒介，太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了。

1996 年年初，中國在自己的內海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引起西方媒介一時嘩然，譴責之聲不絕於耳，美國更是十萬火急調兵遣將，竟派了兩個航空母艦作戰群來威懾。然而僅僅數月之後，日本仗著新簽訂的美日安全體系撐腰，先是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社，繼而一筆勾銷當初與中國達成的對釣魚島“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默契，派人上島立標，公開吞並釣魚島，居然出動軍艦、飛機驅趕中國船隻，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對日本的這等海盜行為，美國和其他西方媒介及其政府竟然裝聾作啞，一聲不吭。要

說威脅，日本人以武力強行解決領土爭端，比中國人在本國領海內演習，是不是更具威脅性？主張“公平”、“正義”的西方媒介為什麼不譴責呢？中國在歷史上就備受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強的侵略，今天在釣魚島再次遭受欺凌，分明是受害者，卻揷上“中國威脅”的黑鍋；真正的侵略者和強盜卻逍遙法外，這算是什麼“公平”和“正義”？更奇怪的是西方媒介對臺灣的態度。臺灣可是被西方輿論認可的“民主社會”。當臺灣海峽形勢緊張時，西方媒介一邊倒地對臺灣表示同情和關切；而當臺灣島內輿論也要保衛釣魚島時，對臺灣的支持就不見了蹤影。一位名叫黎陽的旅美學子在互聯網上發表的一篇題為〈釣魚島風雲背後〉的文章中說得好：

為什麼在臺灣跟大陸鬧糾紛時就支持臺灣，而臺灣與日本領土有糾紛時就不支持臺灣了呢？這些人真講民主、正義和公平嗎？答案只有一個：這些洋大人們只對中國人內戰有興趣，只在中國人內部劃分是非；一旦碰上日本人侵犯中國權益，他們馬上就沒興趣了，大肆宣揚的正義、公平就統統無影無蹤了。

釣魚島事件激得全球華人同仇敵愾，抗日保釣情緒空前一致。西方媒介對這些幾乎沒有任何報道。有的報刊有所提及，卻是在最不顯眼的版面。可是，如果這些華人的情緒是針對中國政府的，這些媒介就會不惜時間和版面，大肆宣揚，惟恐中國不亂。對此，一位名叫馬修·多林的英國人也有同感。他通過互聯網發出一封公開信，對全球華人的“保釣”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對英國廣播公司（BBC）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感到悲哀。多林在信中寫道：

BBC 只對誣衊中國感興趣。對西藏的報道已有了一定之規，對內部不和、社會問題及其他任何把中國反映得很糟糕的事也都

是如此。但是當中國受了冤屈的時候，就沒有報道了。你可以打賭，假定中國侵犯了某個日本的島嶼，那一定會成為 BBC 新聞節目的要聞。

他說：“BBC 的路線就是，‘除非我們能夠給中國抹黑，否則就別提中國’。”應該說，其他西方主流媒介的方針也是一樣的。

以這樣的方針報道中國，究竟是促進對中國的理解，還是在播種對中國的仇恨，那是可想而知的。

敵意何來？

種種事實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介，的確對中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敵意。他們對中國的報道，與他們自己的新聞學原則都是違背的，更談不上客觀公正了。

那麼，他們的偏見和敵意究竟從何而來呢？

就美國的主流新聞媒介而言，我以為，這種敵意可謂源遠流長。1983 年，我在美國進修時，一位美國歷史老師向我介紹了美國學者哈羅德·伊薩克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劃分的七個階段：第一階段，尊重階段 — 從美國建國前後到 1848 年，一個歷史幾乎為零的國家對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自然產生了敬意；第二階段，輕蔑階段 — 從 1848~1905 年，老大的中華帝國裹足不前、日益衰敗，使咄咄逼人、正在擴張的美國滿心瞧不起；第三階段，“仁恕”階段 — 從 1905~1937 年，義和團起義之後，美國作為出兵鎮壓義和團起義的八個列強之一，利用滿清政府對美國的庚子賠款，出資在中國辦學堂，以為這是對中國的“仁恕”；第四階段，讚美階段 — 從 1937~1944 年，這是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利益一致，美國需要中國的力量，因而對中國軍民

有過短暫的讚佩；第五階段，失望階段 — 從 1944~1949 年，這是由於美國寄予莫大希望的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敗無能，土崩瓦解，引起美國的極大失望；第六階段，仇視階段 — 從 1949~1972 年，因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並領導著中國，這對於把共產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美國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第七階段，從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中美關係雖已解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由於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美國對中國該採取何種態度，還猶疑不定。

伊薩克對今天的中美關係如何看法，我沒有去瞭解。但是根據美國政界和輿論界的現實表現，人們不難看出，當今美國政界和新聞界決策層有相當多的人，對中國仍是敵視的。同時，按照伊薩克劃分的這七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從 1848 年以來將近一個半世紀中的絕大部分時間，美國對中國都是輕蔑的、仇視的，即使是“仁恕”，也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性質。這一切，都是從“美國中心主義”出發，對中國沒有平等可言。要知道，“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寫在美國《獨立宣言》裡的。為什麼對中國人，就不講平等了呢？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威廉姆斯在他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悲劇》一書中指出，許多美國人以為，“其他國家的人民除非走美國的路，否則就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把創造出並欣賞著一種不同（於美國）的生活方式的外國人視為低下、落後，應當按美國模式來教育和改造”。可以想見，在這樣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該會多麼偏頗。

歷史是美國新聞專業學生的必修課。我在美國進修時，專門學過美國外交史。當時的第一感覺是，美國這方面的專著種類之多，確實令人驚訝。無論是研究的題目還是觀點，各種各樣，所

依據的材料來源似乎也十分豐富。然而時間稍長，我便感到在那眾多的史書中，缺了點什麼。因為那些教科書、參考書，都是美國歷史界和政界人士撰寫的，儘管他們彼此觀點不同，有些甚至對美國政府抱有相當激烈的批評態度，但終究都還是從美國人的立場、角度來看待問題，解釋問題的。非美國人的著作極少見到，更不要說用做教材了。像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墨西哥人等等，對他們各自的國家在歷史上與美國的衝突是什麼看法，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很少能得到真實完整的反映。而這些國家的人在歷史上，有的現在仍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犧牲品。受著這樣一種歷史觀的陶冶，美國新聞界對中國的態度，怎麼能做到客觀公正？

從“美國中心主義”出發，美國主流媒介有著強烈的泛美主義思想。這一點，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被視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的新聞類週刊《時代》的創辦人之一亨利·盧斯。盧斯於 1898 年生於中國的山東煙臺，父親是一位傳教士。盧斯成長的時代，正是美國開始在世界擴張，一步步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可以說，他是和美國的擴張主義政策一起長大的。盧斯全身心地支持這個政策，是最先提出“20 世紀是美國世紀”的人之一。早在 1920 年，22 歲的盧斯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寫的一篇文章中激勵他的同齡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奮民族精神”。他在文中寫道：

當我們在 20 年後講到“美國”時，願這偉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著兩點：第一，美國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美國公民有權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貿易和生活，無論美國的商人走到哪裡，他們的經濟理想都要得到承認；第二，但凡發生國際爭端，都可指望美國來協助解決……

從這一立場出發，盧斯和與他共同在 1929 年 3 月創辦《時代》週刊的布里頓·哈頓在創刊號上直言不諱地宣佈：

在公共問題和重大新聞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中立，也不應當持完全中立的態度。因此，編輯不能沒有某種偏見……

出於這種“理想”和“偏見”，盧斯對凡是阻礙美國的“經濟理想得到承認”，也就是說對阻礙美國在世界擴張的國家，當然抱著敵視的態度。妖魔化的工作早在 30 年代就已開始了，不過那時首當其衝的對象是蘇聯，是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儘管後來成為獨裁者、法西斯頭目，但由於他被盧斯視為反蘇盟友，《時代》週刊仍不惜筆墨，為他粉飾。而對斯大林，則是另一種態度。且看當時《時代》對這兩個人的形容：墨索里尼一出現，總是“面色紅潤”，“愉快”，“笑逐顏開”；斯大林則“面容露出殘忍的神色”，面孔“儼然是東方人無情的堅硬面罩”。墨索里尼“著裝整潔”，斯大林是“衣冠不整”。講起話來，墨索里尼是“宣佈”，“命令”，“說”，而斯大林只要一開口，就是“吼叫”，“厲聲喝道”。大群人的出現，在意大利是“群眾”，在蘇聯就成了“暴民”。就連天氣和景物，蘇聯的也必然是“凜冽”，“單調”，“荒涼”；意大利則是“溫暖”，“明朗”，“親切”。

盧斯早已作古，蘇聯也已經解體。但是，美國主流新聞媒介在冷戰時代形成的思維定式卻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改變。盧斯的陰魂不散，他的手法仍在被沿用。在長達 40 年的時間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聞媒介一直在按照東西方對峙的框架理解並解釋世界的衝突，追隨他們本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共產黨領導的、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一概視為對手或敵人。在他們的字典裡，共產黨、社會主義，就是“極權”、“專制”、“反民主”的代

名詞。給被他們敵視的國家扣上這些帽子，似乎就顯得他們的敵視“合乎情理”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的垮臺，被他們視為“民主”的勝利，因而他們對仍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愈發不能容忍。他們不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這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和建設的考驗，做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抉擇；他們不明白，也不想搞明白，中國共產黨與東歐很多國家共產黨的區別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特色。

其實，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已感到這種思維定勢已經落伍。1993年，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兩主席之一羅薩恩·李奇微針對一些人主張美國的外交政策應從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為主題轉向以“推進民主”為主題提出懷疑，說：“推進民主給了我們一個目標，但是不能給我們一個對世界的理解。它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要在海外捲入（他人的事）。”

可悲的是，美國新聞界總是樂此不疲地向全世界推銷空泛的美國式“民主”，即使那種“民主”已在不少地方引起長期的動亂。然而，他們卻很難糾正他們“從針眼裡”看世界，以至於在他們的報道中常常歪曲世界的狹隘。

從另一方面來說，敵視中國，也是出於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需要。冷戰期間東西方的對峙，造就了美國龐大發達的軍火工業和戰爭機器。如今雖說冷戰已經結束，但他們仍然需要有一個敵人，以為自己繼續生存下去的理由。中國的社會制度、地理位置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他們很方便地找到了敵視中國的口實。此外，他們把中國看作敵人或潛在的敵人，還出於他們制止亞洲崛起，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為所欲為的霸主地位的需要。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告誡美國改變心理狀態，容忍亞洲的崛起。但是美國根本不能允許這種局面發生。而制止亞洲崛起的關鍵便是遏制中國。美國媒介緊跟這一方針，儘管中國的發展並沒有妨礙任何人，

儘管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他們仍然要製造“中國威脅”的輿論，散佈對中國的敵視情緒。

另外，做“秀”的心理，也影響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媒介對中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有些西方記者與其說是在中國採訪，不如說是在做戲，在顯示他們的“英明”與中國人的“愚昧”和“醜陋”，以博得他們主子的賞識。也有些記者生怕被人說成“被洗了腦”，因此不敢實事求是地做與中國有利的報道。

凡此種種，造成了一種“輿論一律”——在西方的主流媒介中，對中國只能說壞，不能說好。這是在標榜“新聞自由”的原則下的輿論一律。這是打著“民主”招牌的輿論一律。這種輿論一律，封堵了真理的聲音，阻礙了西方公眾對真實世界的正確瞭解。新華社前駐華盛頓首席記者李延寧曾經說，比較一個月美國報刊對中國的報道和中國報刊對美國的報道，你會感到中國媒介比美國媒介客觀得多。我對此深有同感。

我曾經在中國的研究生院跟美國的新聞教授學過新聞，又在美國學習過美國歷史，也訪問過不少美國新聞機構。我仍然認為，美國新聞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同時，我也認為，這世界在變，而這變化並不一定是按照美國人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人的意願來的。他們需要對世界有正確的瞭解，而媒介在這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為此，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媒介如不改變他們的那種偏狹和對中國等國家毫無道理的敵意，必將遭到越來越多的人的唾棄。